

满文档案与历史探究

吴元丰 著

满学【清史】专家文库

辽宁民族出版社

满文档案与历史探究

吴元丰 著

●
满学【清史】专家文库

辽宁民族出版社

© 吴元丰 201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满文档案与历史探究 / 吴元丰著. —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15. 11

(满学(清史)专家文库)

ISBN 978-7-5497-1179-6

I. ① 满 … II. ① 吴 … III. ① 满族 — 民族历史 — 档案资料 — 研究 — 中国 IV. ① K2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53671号

满文档案与历史探究

MANWEN DANG'AN YU LISHI TANJIU

出版发行者: 辽宁民族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印 刷 者: 沈阳旭日印刷有限公司

幅 面 尺 寸: 180mm×250mm

印 张: 33.75

字 数: 550千字

插 页: 1

出 版 时 间: 2015年12月第1版

印 刷 时 间: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责 任 编 辑: 吴昕阳 李 璜

封 面 设 计: 杜 江

责 任 校 对: 林 华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97-1179-6

定 价: 68.00元

法律顾问: 陈 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网 址: www.lnmzchs.com

举报电话: 024-23284336

邮购电话: 024-23284335

联系电话: 024-23284340

淘宝网店: <http://lnmz2013.taobao.com>



吴元丰 1956年8月出生于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1978年、1986年分别毕业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满文干部培训班和北京师范学院夜大历史系。现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巡视员、研究馆员，主管满文处，并任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理事、中国蒙古史研究会理事、北京满学研究会理事。长期从事清代满文档案的整理、编目、翻译和研究工作，主持编译出版《锡伯族档案史料》《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清代东归和布克赛尔土尔扈特满文档案全译》《清代鄂伦春族满汉文档案汇编》《清代珲春衙门档》《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等20余部档案史料和目录。同时，还研究满文历史文献、清代边疆史地、民族史和中琉关系史，发表论文70余篇。

前言

距北京数千公里，位于伊犁河南岸的察布查尔县，是清代“锡伯营”军民后人的居住地，也是我的出生地。18世纪中叶，清朝统一新疆天山南北后，为了加强西北边疆防务，由辽宁各地抽调一部分锡伯官兵携眷移驻伊犁，组建了“锡伯营”，成为当时伊犁驻防八旗的劲旅之一。由此开始，这部分锡伯军民扎根在西北边疆，在肩负戍边屯垦使命的同时，发展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新中国成立后，在锡伯族聚居的乌孙山迤北、伊犁河以南这片环境优美、气候宜人、物产丰富的沃土上，于1954年成立自治县，命名为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是迄今为止全国唯一的锡伯族自治县。当地的锡伯族至今仍保留着自己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特别是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因为历史的渊源关系，与满语文十分相近。

1973年，为了解决满文专业人才极其匮乏的问题，经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建人的提议，周恩来总理特批，责成故宫博物院开设“满文班”培养人才。招收学员时，考虑到察布查尔锡伯族所使用的语言文字与满语文基本相同，决定从北京和黑龙江招收学员外，从察布查尔招收锡伯族学生6名。1975年夏季，故宫博物院派人到察布查尔招收学员，恰逢我高中毕业，因报名人数多而名额有限，经过层层选拔，最终与其他5名学生一起被录取，开始了在北京的学习与生活。当时的“满文班”设在故宫东华门内，共招收学员21名，学制三年，教学规程严密，没有寒暑假，实行严格的考勤和考试制度。通过三年的学习，不仅掌握了从事满文档案工作的基础知识，同时也具备了从事明清历史档案工作者所应有的专业素养。

1978年7月“满文班”结业，所有顺利毕业的学员都分配到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满文组工作，专门从事清代满文档案工作。1980年，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划归国家档案局，改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组改为满文部。这一改变，预示着明清档案工作将全面恢复和开展。此时我已工作3年，通过工作实践，深深感到要做好满文档案工作，不仅需要满语文和档案学方面的知识，还需要掌握大量历史及典章制度等方面的知识。当时全国高考刚刚恢复，本想通过上大学进一步丰富自己的知识和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但因工作需要未获单位批准。1981年9月，首都师范学院历史系开设“夜大班”，经过报名考试我被录取。当时还没有实行双休日，每周上6天班后，周一、三、五晚上和星期天上午半天，都从故宫骑自行车到学校上课，每次骑车往返约20余公里路程，风雨无阻，整整坚持了5年时间，直至1986年7月毕业。本次“夜大班”的教程，完全按全日制班的教学计划实施，学制较全日制班增加1年，同时各门课程都安排优秀资深的老师授课。通过“夜大班”的学习，比较系统地掌握了历史和古典文献等方面的理论知识以及研究方法，为从事历史档案工作和开展学术研究打下了基础，受益匪浅。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明清两朝历史档案近1000万件，其中满文档案约200万件，占整个馆藏档案的五分之一。初到故宫的时候，由于满文人才缺乏，故宫所存的满文档案，绝大部分都未经整理编目，仍处在成捆成包堆放的状态，甚至有的还装在麻袋里存放。这种保存状况，对档案的保护和利用都十分不利，但凡利用档案，就得成捆成包地提调，逐捆逐包地翻阅查找，极其费时费力，有时翻阅一天查不到一份所需要的档案，而且这种利用方式也不利于档案原件的保护。1978年“满文班”结业后，满文档案专业人员剧增到29人，开展满文档案工作的大好局面由此开启。

档案工作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包括保管、整理、编目、利用、修复、编辑等业务工作。所以，综合型档案馆一般都按业务功能分设其内部机构，专门负责相关业务的开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作为国家级综合型历史档案馆，由于保存大量的满文档案，因此，除按业务功能分设保管、整理、编目、利用、复制、编研等内部机构外，还特设满文部（今改称处），专门负责开展满文档案的整理、编目、翻译、编辑、出版和咨询等工作，当馆内其他业务部门遇到与满文有关的问题时，还及时协助处理。满文部是一个综合型的业务职能部门，业务涵盖满文档案的各个方面，工作内容繁杂，工作任务艰巨，工作责任

重大。作为一名满文档案工作者，除具备综合性的业务知识和能力外，还需要拥有甘于寂寞、甘于吃苦、甘于奉献的职业精神。

光阴似箭，从1975年“满文班”开设到现在，已经过去了40年时间。由于挚爱自己所学的满文和所从事的满文档案工作，所以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或阻力，甚至是诱惑，都未曾动摇过自己的决心和信念，一直默默无闻、持之以恒地工作，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从一名普通工作人员逐渐成长为业务骨干和部门负责人，所承担的责任也越来越重。即使如此，自己也在做好部门的组织领导和业务指导工作的前提下，尽量抽出时间和花费精力承担完成具体业务工作。回顾起来，主持整理的有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上谕档、寄信档、议复档，以及内阁满文题本（包括残题本）、内务府满文杂件、宗人府满文档案、宫中满文朱批奏折、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档案、珲春副都统衙门档案、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档案和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等，共计170万件（册）。另外，又主持编译出版《锡伯族档案史料》《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全译》《清代鄂伦春族满汉文档案汇编》《清宫珍藏海兰察满汉文奏折汇编》《清宫珍藏杀虎口右卫右玉县御批奏折》《清代霍博克赛里土尔扈特满文档案全译》《内阁藏本满文老档》《清内阁蒙古堂档》《清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清代内阁六科史书·吏科》《珲春副都统衙门档》《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等17种800余册档案史料，以及《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西藏与藏事档案目录》（满文藏文部分）、《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3种14册目录。以上各项整理工作的开展，从根本上改变了满文档案的整理基础和保管状况，为实现满文档案管理工作的科学化和现代化，以及提供快捷便利的利用途径，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和保证。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依据，而诸多满文档案史料的编译出版，为相关历史研究领域提供了新鲜翔实的第一手史料，有助于更加深入、系统地开展研究，有效地发挥了历史档案应有的价值和作用，其社会效益无可估量。

档案馆的基本职责是保管好、整理好、利用好所存档案，因而作为一名档案工作者首先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是天经地义、不可动摇的，而且要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工作。至于研究，对档案工作者而言虽属一种业余爱好，但恰恰是提高个人学识水平的最佳途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着大量的、珍贵的、稀见的明清档案，可以说是一座蕴藏丰富知识的宝库。在工作过程中，每时每刻看到的都是档案，触摸的都是原始资料，只要用心和细致，捕捉

的都是档案所承载的逝去的时光、隐去的秘密。在如此独特而优越的工作环境下，逐渐养成了结合本职工作探索和研究问题的习惯，而且动笔撰文发表，为学术研究尽些微薄之力。随着研究文章的不断发表，业务能力也不断提高，其结果是工作与研究齐头并进，相得益彰。如今回头看，是档案工作造就了个人的一些成绩，但个人的研究又成就了档案工作在更高层次上的开展。

从1981年发表处女作《锡伯族西迁概述》至今，已经过去了35年时间。在这35年间，撰写发表文章共72篇。纵观这些文章的内容，涉及满文古籍文献方面的有23篇、锡伯族历史方面的有22篇、边疆史地方面的有20篇，清代中国与琉球关系史方面的有7篇。所有文章都是结合本职工作，充分利用满文档案，参考其他文献而成，并发表于学术刊物上，受到学术界同仁的肯定和赞赏。其中不少文章具有一定的原创性和创新性，或提出新观点，或填补空白，或更正讹误，或评价新史料。如：《锡伯族西迁概述》一文，在全面阐述锡伯族西迁的背景、原因、经过和意义的基础上，明确提出锡伯族西迁并非“分而治之”，而是国家“巩固边防”之需要；《清初册封琉球国王尚质始末》一文，详尽论述清朝入关后与琉球国正式建立宗藩关系的过程，从而填补了国内外在此研究领域的空白；《清代乌鲁木齐铁厂研究》一文，开创性地探讨清代乌鲁木齐铁厂设置的背景、原因及其管理、规模、作用等方面问题，填补了新疆地方史研究领域的空白；《柯尔克孜族东迁黑龙江地区考实》一文，深入探讨柯尔克孜族的来源及其东迁的原因、过程、安置等方面问题，并更正了以往多年研究过程中出现的诸多讹误。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满文档案对清史、满学、民族史、边疆史地等方面研究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和价值。

近几年来，辽宁民族出版社特别重视有关清史、满学和北方民族历史文化方面学术成果的出版，特别是先后推出“满族（清代）历史文化研究文库”和“满学（清史）专家文库”两大系列学术丛书，对学者和学界来讲，都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今幸蒙辽宁民族出版社约我选编出版一本论文集，拟纳入“满学（清史）专家文库”系列丛书。对此，我欣然应允。因锡伯族历史方面的相关文章已于2008年5月汇集成册，冠以《锡伯族历史探究》之名，由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所以此次选编时只收录有关锡伯族历史文章2篇。本书共选录文章41篇，分成两编，上编为“满文档案”，选录19篇；下编为“历史探究”，选录22篇。另外，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出版之际，恰逢本人就读的“满文班”开办40周年，所以，特将《故宫博物院满文干部培训班》一文作为附

录选入，以志纪念。

本书辑的所有文章，均未经大的修改，只是文字方面略有改动，基本上保持了原貌，每篇文章之后，尚标有原载刊物的名称和时间。辽宁民族出版社吴昕阳女士、李璜女士，为本书的编辑出版费心费力；同仁王景丽女士、韩晓梅女士协助校对清样，在此谨表谢忱。

吴元丰

2015年1月6日

目 录

上篇 满文档案

满文与满文古籍文献综述	003
清内阁满文档案述略	023
军机处满文月折包及其史料价值	034
理藩院满蒙文题本	056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	061
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及其满汉文档案	065
珲春协领副都统衙门及其满汉文档案	080
满文月折包内漠南蒙古地区史料	098
新疆历史满文档案概述	108
军机处满文月折包内新疆史料	119
和布克赛尔土尔扈特满文档案	131
新近发现的锡伯族档案及其研究价值	139
鄂伦春族满汉文档案简述	147
海兰察满汉文奏折述要	149
黑龙江地区柯尔克孜族历史满文档案	153
清代杀虎口右卫右玉县事宜满汉文奏折	167
新近发现的清代中琉关系满汉文档案	171
《满文老档》刍议	183

近百年以来满文档案编译出版综述

——以中国大陆为中心	199
------------------	-----

下篇 历史探究

清代伊犁将军衙门内设机构浅析	219
清代伊犁满营综述	226
清代伊犁察哈尔营述论	242
清代伊犁锡伯营综述*	257
清代乌鲁木齐满营述论	271
索伦与达斡尔西迁新疆述论	284
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及其意义	299
塔尔巴哈台游牧蒙古述要	311
乾隆年间伊犁屯田述略	324
清代伊犁回屯	336
乾隆年间伊犁遣屯	357
乾隆年间伊犁遣犯为民后的屯田	370
乾隆年间新疆新普尔钱的铸造流通及其作用	379
清代乌鲁木齐铁厂研究	396
清初锡伯族居住区域及与相邻民族的关系	412
柯尔克孜族东迁黑龙江地区考实	421
清廷册封瓦里苏勒坦为哈萨克中帐汗始末*	
——兼述瓦里汗睦俄及其缘由	434
南明时期中琉关系探实	444
清初对待琉球态度问题研究	455
清初册封琉球国王尚质始末	466
清代琉球来华使节类别综析	481
清代琉球来华使节的进京及其待遇探析	503
附：故宫博物院满文干部培训班	517

上篇 满文档案

MANWENDANGANYULISHITANJIU

满文与满文古籍文献综述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自古以来，各个民族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本民族文化，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共同的中华民族文化。满族作为曾经建立过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民族，不仅创造了自己的文字——满文，而且将满文作为清朝的法定文字来推广和使用，形成了大量的满文古籍文献，包括图书、档案、碑刻、谱牒、舆图，等等。在中国55个少数民族古籍文献中，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满文古籍文献都属于最多的一种。它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一、满文的创制及其改进

满族的祖先肃慎人有无自己的语言文字，因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但有据可考的是，女真作为满族的先人，起先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自己的文字，而借用契丹字。女真首领阿骨打建立金国后，出于治国的需要，金太祖阿骨打命完颜希尹创制女真文。完颜希尹奉命“依仿汉人楷书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真字”。这种女真字史称“女真大字”。“女真大字”通用十几年后，金熙宗完颜亶又创制了一种女真字，史称“女真小字”。从此以后，两种女真字开始并行通用。金灭亡后，进入中原的女真人受汉文化的影响，逐渐汉化，皆改用汉语文，不再有人知晓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而留在东北的女真人仍然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到了明朝后期，除本民族的语言仍被使用外，文字业已开始被废弃，逐渐变得无人知晓，女真人改用蒙古文字了。

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基本上统一了女真各部,女真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都得到迅速发展,与明朝、蒙古各部的联系日趋频繁,仍借用蒙古文字记事和交际,已不适应女真社会全面发展的需求。1599年(明万历二十七年),努尔哈赤决定创制本民族的文字,并命额尔德尼和噶盖创制。具体创制的过程,在《满洲实录》内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这年二月,努尔哈赤想仿照蒙古字创制本民族的文字,并将想法和设想告知文臣额尔德尼和噶盖,要让他们具体实施。于是,额尔德尼和噶盖对努尔哈赤说:“我等习蒙古字,始知蒙古语,若以我国语编创译书,我等实不能。”努尔哈赤说:“汉人念汉字,学与不学者亦皆知。蒙古之人念蒙古字,学与不学者亦皆知。我国之言与蒙古之字,则不习蒙古语者不能知矣。何汝等以本国语言编字为难,以他国之言为易耶?”额尔德尼和噶盖回答说:“以我国之言编成文字最善。但因翻编成句,吾等不能,故难耳。”努尔哈赤对二人说:“写阿字,下合一玛字,此非阿玛(引者注:阿玛系满语,意为父亲)乎?额字,下合一默字,此非额默(引者注:额默系满语,意为母亲)乎?吾意决矣,尔等试写也。”由此可见,在满文的创制过程中,努尔哈赤作为女真的杰出首领发挥了决策和指导作用。额尔德尼和噶盖奉命创制满文后不久,噶盖“以事伏法”,而由额尔德尼单独承担完成了创制任务。满文的创制和颁行,完全适应了女真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有助于推动女真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政权的建立。

额尔德尼等所创制的满文,是在蒙古文字基础上创制的,其字母基本上仿照蒙古文字母而成,没有圈点,称为“无圈点满文”,或“老满文”。这种满文,因属初创,存在一定的缺点和不足。正如《满文老档》内所指出:“十二字头,原无圈点,上下无别,故塔、达,特、德,扎、哲,雅、叶等不分,均如一体。若寻常语言,按其音韵,尚可易于通晓。若人名、地名,则恐有误。”归纳起来讲,老满文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字母的书写形式不规范,同一个字母有几种书写形式,往往出现混淆,不便于使用;二是一字多音,即辅音和辅音的音位混乱,致使字母之间互相假借,较难识别;三是音译汉语借词,如人名、官名、地名和物名等,明显感到已有的字母不够用。所以,随着女真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老满文”所存在的问题日益突出,无论是学习,还是使用,都越发感到不方便,对其改进和完善,已成必然之事。

在“老满文”使用33年后,即1632年(后金天聪六年)初,努尔哈赤的

继承者皇太极颁令，由达海承担完成了改进“老满文”的任务。据《国朝耆献类征·达海传》记载：皇太极“谕达海曰：‘国书十二字头，向无圈点，上下字雷同无别，幼学习之，遇书中寻常语言，视其文义，犹易通晓。若人名、地名，必致错误。尔可酌加圈点，以分析之，则意义明晓，于学字更有裨益矣。’达海遵旨，寻译，酌加圈点。又以国书与汉字对音未全者，于十二字头正字外，添加外字。犹有不能尽协者，则以两字连写切成，其切音较汉字更为精当”。达海对“老满文”的改革主要有以下四方面：一是在一些“老满文”字母的旁边添加圈点，使原先雷同的字母得以区别，做到一字一音；二是创制特定字母，以便于准确地拼写外来借词；三是创制满文字母的连写切音形式，解决了音译人名、官名、地名和物名等词汇时容易出现差错的问题；四是规范字体，统一书写形式，消除了过去一字多体的混乱现象。经达海改进的满文称为“有圈点满文”，或“新满文”。现在人们通常所说的满文，一般是指“新满文”。

满文有楷书、行书、草书和篆书四种字体。楷书的使用范围较广，使用于各种书籍的刊刻、精写本的抄写，以及诏书、谕旨、奏折、题本等公文的缮写。行书的使用范围更为广泛，凡书籍普通写本的抄写、各种书稿的起草、中央到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及官员之间来往文书的缮写，以及各类公文档案的汇抄存档等方面，都要使用行书。草书的使用范围较窄，主要用于一些文稿的起草、个人信件和札记的缮写，以及书法作品的创作等方面。满文的篆字，早在满文创制之初就已出现，只是种类较少，字体单调，使用不广。正如《清朝通志》所载：“清字篆文，传自太宗文皇帝时，是清篆原与国书先后并出，特以各体未备，传习尚稀。”1748年（乾隆十三年），清乾隆帝命傅恒等人，仿照汉文篆字，重新创制了满文篆字，共计32体，并确定了各体篆字的满汉合璧名称，即玉筋篆、芝英篆、上方大篆、小篆、钟鼎篆、垂露篆、柳叶篆、殳篆、悬针篆、龙篆、穗书、鸟迹篆、垂云篆、鸾凤篆、科斗书、龟书、倒薤篆、鸟书、坟书、大篆、麟书、转宿篆、雕虫篆、刻符篆、金错篆、鹄头篆、飞白书、龙爪篆、奇字、璎珞篆、剪刀篆、碧落篆。从此，满文篆字的种类增多，字体规范，名称统一。为了推广新创制的满文篆字，当时用32种字体刊印了《御制盛京赋》。不过，满文篆字的使用范围较窄，在清代主要用以镌刻宝玺和官印。

从满文的初创到改进，用了30余年时间，最终使满文成为一种便于使用

且完善的文字。无论是老满文，还是新满文，其推广使用都经过了一个过程。满文的创制与改进一样，都是在女真最高统治者的决策和指导下完成的，所以两者的推广和使用，必然都会采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具有十分有效的作用。满文初创之后，由于大力推广，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得以推广使用。仅从现存的用老满文写的原始档案来看，最早的是1607年（明万历三十五年）《满文老档》。这就说明，老满文于1599年（明万历二十七年）创制后，最晚在1607年（明万历三十五年），即创制后的8年时间内，至少普遍使用于公文的书写方面。至于改进后的新满文何时得到普遍推广，在史籍内未见明确的记载，但从现存的原始档案中也看到一些基本情况。1632年（后金天聪六年）完成了对老满文的改进后，必定会立即推广使用。然而，在1636年（清崇德元年）《满文老档》内新老满文同时出现，而且仍然存在老满文中的一些问题，识别较难。截至崇德末年，在公文档案内才没有了新老满文兼用的情况，完全用新满文书写，字体熟练而规范。由此可见，新满文的推行，至清崇德末年才基本完成，用了十余年时间。清入关建立全国性的政权后，满文的使用范围更加扩大，除满族原先居住的东北地区、中央国家机关和宫廷各部门普遍使用外，派驻八旗满洲兵丁的全国各重镇要地也都使用满文。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朝的国力逐渐衰弱，同时满族接受汉文化的程度也越来越深，满文的应用情况也每况愈下。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清朝的覆灭，加速了满文退出历史舞台的步伐。

有清一代，除满族使用满语文外，与其相邻或编入满洲八旗的达斡尔、锡伯、鄂温克等民族还曾使用过满文。在民国时期，居住在呼伦贝尔地方的达斡尔族仍然用满文书写信件和公文。1979年，笔者到莫力达瓦达斡尔旗进行历史调查时，在当地还有一些老人懂满文。另外，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从辽宁携眷移驻新疆伊犁的锡伯官兵及其后裔都普遍使用满语文。20世纪40年代，对满文进行了稍加改革后作为本民族的文字使用，时至今日仍在使用。这对满文的传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二、满文古籍文献及其种类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以满族上层为主体联合其他民族的上层建立起来的封建政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历时290余年之久。有清一代，满文